

我国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特征研究

王莹 胡颖

摘要:对21所高校的246名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在21所院校的数量分布严重不均,年龄分布以中年为主、研究方向呈现院校特色化和宏观化、教育背景多元化和国际化程度普遍较低的特征。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研究队伍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加强院校之间的沟通交流、提倡微观研究、保持研究人员教育背景的多元化和提高国际化程度。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特征

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们见证高等教育学的历史轨迹,把握高等教育学的跳动脉搏,预测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方向。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数量、质量及结构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健康、持续和繁荣发展。本文通过对21所高校的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的基本情况、教育背景和研究方向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当前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队伍的特征。

一、研究对象

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我国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的状况,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另一类是这些研究机构的专职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

(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根据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各个院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发展情况,本研究选取了21所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研究机构。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首先,是高等教育界的

“四大元老”,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高教所和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这四个机构分别在1986年、1990年、1993年和1996年获得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其次,是从2000年到2006年之间获得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7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第三,是5所在2006年准许在教育一级学科下直接招收高等教育学博士生的高校,分别是:浙江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第四,是5所在高等教育研究事业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团队,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武汉大学高教所和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二)研究人员

在本研究中,主要选取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即这21所高校的研究机构中专门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人员。例如,在21所高校中,部分高校的教育学院专门设立有高等教育研究所,这些所里的研究人员都是本次研究的选取对象。对

作者简介:王莹,女,河南郑州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理论 (厦门 361005);胡颖,女,湖南长沙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厦门 361005)

于那些没有专门设立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则主要根据院校网页信息选取那些从事高等教育学教学与科研的人员为研究对象。

(三) 研究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的相关材料和数据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获得:第一,通过查询21所高校的院校网页,选择研究对象以及收集研究对象的个人基本情况、教育背景和研究方向。第二,通过期刊杂志收集研究对象的年龄信息。第三,通过电子邮件与部分研究对象取得联系,获得前两种途径依然无法得知的信息。尽管如此,研究人员的教育背景信息仍然有部分缺失,因此后文关于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教育背景的统计分析以搜集到相关信息的人数为准。

二、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的现状

根据统计,21所高校的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总数为246名。他们在各高校的数量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21所高校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统计情况

学校	人数 (人)	所占比例 (%)	学校	人数 (人)	所占比例 (%)
厦门大学	26	10.57	陕西师范大学	12	4.88
北京大学	20	8.13	浙江大学	12	4.88
华中科技大学	19	7.72	南京大学	10	4.07
苏州大学	18	7.32	北京理工大学	7	2.85
华东师范大学	16	6.50	华南师范大学	7	2.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5	6.10	华中师范大学	6	2.43
清华大学	13	5.28	南京师范大学	5	2.03
上海交通大学	13	5.28	西南大学	4	1.63
武汉大学	13	5.28	东北师范大学	4	1.63
北京师范大学	12	4.88	西北师范大学	2	0.81
湖南师范大学	12	4.88	总计	246	100

注:表中所占比例为各个院校的专职研究人员人数与统计的总人数(246位)之间的比值。

数据来源:根据21所高校院校网页中的师资简介统计整理而得。

研究人员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研究机构的实力,根据表2可以发现,最早获得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厦门大学拥有的专职研究人员最多,占到总人数的10.57%。而作为“四大元老”的另外三所高校,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专职研究人员也都占了较大比例,依次为8.13%、7.72%和6.50%。这四所高校的人数总和达到81人,占了总人数的32.92%,在2000—2006年之间获得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七所高校,大都拥有较强的专职研究人员队伍,只有华南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人数较少。在另外五所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高校中,浙江大学的专职研究人员数量相对较多,占了总人数的4.88%,而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等四所高校的情况相对一般,四所学校合计的专职研究人员所占比例只有总人数的6.50%。其中,西北师范大学仅有两个专职研究人员,也是在调查的21所高校中人数最少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五所高校尽管只有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但借助教育经济与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学科专业开展高等教育学博士生教育,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队伍的数量上也可以发现这些院校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拥有良好的基础。它们的专职研究人员所占比例分别达到了6.10%、5.28%、5.28%、4.88%和2.85%。

在21所高校中,师范大学有9所,共有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76位,占总人数的30.89%。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四所大学的专职研究人员数量在10位以上,其他五所师范院校的研究人员数量较少。与综合性大学相比,师范大学的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的整体力量相对偏弱。这与我国师范大学一直以来主要以基础教育研究为主,对高等教育研究没有给予较多关注有直接联系。

研究人员的数量虽然无法完全体现一个学术机构的实力,但却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发展情况。统计表明,一些传统的强势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拥有较多的专职研究人员,保持了较强的研究实力,一些

后发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发展很快,建立人数较多的专职研究人员队伍,与此同时,也有部分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专职人员数量很少,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另外,在246名研究人员中,男性一共有168位,占了总人数的68.29%,而女性只有78位,这表明在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中,男性发挥着主要力量。尽管现在有一部分研究者,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女性研究人员不断提倡需要寻找一种适合女性的研究思维方式,并且倡导女性应该具有和男性一样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但真的要改变这一现状,还需要一段艰难且漫长的道路。

三、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的主要特征

虽然这246位研究人员只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全部专职研究人员的一部分,但是通过分析这246位研究人员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反映出当前我国整个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队伍的特征。

(一) 年龄结构

根据年龄的具体分布情况,笔者选取25岁为起点,每10岁定为一个年龄阶段进行人数统计。表2呈现了每个年龄段研究人员的数量统计情况。

表2 246位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年龄分布统计

年龄区间	25—35	36—45	46—55	56—65	66—75	76—100
人数(人)	31	72	95	41	4	3
所占比例(%)	12.60	29.27	38.62	16.67	1.63	1.22

注:年龄数据均为2012年秋查询所得。

数据来源:21所高校的院校网页中的教师个人信息简介,部分数据通过查询期刊杂志的作者简介或者直接联系相关研究人员获得。

根据表2的统计,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36岁到55岁之间,这一年龄段的学者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共占了67.89%。在这167位研究者中,涌现出了一批为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不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且还带领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不断发展壮大,为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年龄在25—35岁和56—65岁阶段的研究人员分

别有31位和41位,这两个年龄段的研究人员虽然没有36—55岁年龄段的人员数量多,但也在高等教育研究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5—35岁的研究人员,他们承担着高等教育研究事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责任。而年龄位于56—65岁之间的研究人员大多数已经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值得关注的是,年龄位于66—75岁之间有4位,在76—100岁之间的有3位。其中,潘懋元教授作为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为创建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丰富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当前在高等教育研究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青年研究者。而王承绪教授在引领比较教育研究方向和促进学科建设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

(二) 主要研究方向

在分析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时,发现每个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并不是唯一的,都有几个主要的研究领域。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发现研究者在研究方向上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同为一个研究机构的研究者,研究方向相对一致。例如,在华中科技大学,19名研究者中就有12名的研究方向都涉及高等教育管理;在上海交通大学,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研究者基本各占总人数的一半;北京大学的20名研究者中也有8位都是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

由于研究者的研究方向相对集中,也使各个研究机构在外部表现出不同的研究特色。如厦门大学比较偏重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研究、浙江大学偏重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偏重工程教育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偏重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偏重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偏重大学课程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则主要进行教学论方面的研究。

研究特色和研究队伍的方向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一旦一个研究机构有意形成一定的研究特色,就会吸引做此方面研究的人员前来工作。充足的研究人员聚在一起所形成的研究实力就会促进院校的研究特色更加明显。仅从这种循环发展模式来看,对于研究机构的发展和研究人员的成长都是有益的,但若着眼于高教研究的整体未来发展则会发现这种情

况所带来的弊端。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与社会的其他系统紧密相关,高等教育的这种复杂性就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因此各个研究机构都需要持整体和联系的眼光,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同时,也不排斥有别于本院校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同时各个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員之間應該經常交流和互動,共同為我國高等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繁荣发展。

第二,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涉及微观层面的研究主题相对较少。我国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经济学、比较高等教育、外国(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等。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反映出重高等教育管理,重比较高等教育,重外国(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的特点。据了解,北美与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主题主要为教与学、课程设计、大学生经验、学习方式、系统政策、院校管理和学术职业等。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背景与国外不尽相同,但与之相比较,会发现我国学者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而对于大学的教与学、课程、大学生经验、学术职业等微观主题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

(三)教育背景

由于相关资料不完善,在对246位研究者的教育背景信息进行的搜索中,收集到172位研究者的信息。因此,教育背景的分析主要以这172位研究者的信息为基础。

1.学科背景

调查发现,这172位研究者中很多人员在本科或者硕士期间甚至是博士期间所读专业并不是教育学,但现在却从事高等教育学方面的研究。在172位研究者中,本科阶段就读教育学专业的仅有63位,占总人数的36.63%。而在硕士期间就读教育学专业的人数就有大幅提高,增加到106人,占总人数的61.63%。在博士期间就读教育学专业的人数比硕士阶段的又增加了11位,所占比例超过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通过这个现象,可以发现研究者中既有教育学出身的,即常被提到的“科班出身”。也有就读其他学科的后来转向教育学研究领域的,即所谓的“半路出

家”。“科班出身”的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有利于高教研究的专业化,“半路出家”的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则能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探讨。在高等教育学科建立初期,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呈现多学科背景,老一代的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大多来自不同的专业和领域。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硕士生和博士生人数的增加,“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则越来越多。在未来的高教研究发展中,还是应该保持两类研究人员的适度均衡,从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特色,以免造成只站在自己的视野中看问题、研究问题的现象。

2.留学情况

首先,研究者出国或者到港台读书的人很少。在172位研究者中,博士期间外出留学的人数最多,有27人,但也仅占总人数的15.70%。而在本科阶段,外出留学的只有5位,其中4位是到国外留学,另外一位是在台湾淡江大学接受本科教育。其次,研究者到外面留学的时间较短。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阶段,到国外和港台读书的人数是逐渐递增的,从5位到27位。这也说明大多数研究者都是在硕士或者博士阶段才出去学习深造,因此在外面学习的时间仅有两三年。再者,在博士后阶段,外出深造研究的人数也很少,仅有9位。最后,在地区选择上,美国成为最多人选择留学的国家,其次是英国,接下来是日本和香港。这几个地区的高等教育都较为发达,因此成为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学习深造的首选地区。其他几个国家或者地区只是偶尔会有人选择,一般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学校与某些研究人员所在的院校或者是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3.访学情况

由于国外访学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此,本研究对访学情况进行了时间上的界定:主要对访学时间超过三个月以上的人员进行了统计整理,不足三个月的没有涵盖在统计结果之内。在统计中,具有三个月以上访学经历的研究人员有64位,占总人数的37.20%,他们主要分布在10所高校。显然,具有访学经历的研究人员还是多于出国留学的研究人员。10所院校中具有访学经历的研究人员数目的统计情况见表3。

从调查中发现,只有10所高校的研究人员具有

表3 10所高校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访学情况统计

学校	厦门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浙江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访学人数(人)	15	10	8	8	7	4	4	4	2	2

数据来源:根据21所高校院校网页中的师资简介统计整理而得。

访学经历,还有11所高校的研究人员没有访学经历,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还不高。厦门大学研究人员外出访学的人数最多,而且访学国家(地区)也最广泛,分别涉及到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荷兰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由于厦门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始进行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学术基地,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其与多个国家(地区)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都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彼此之间不断交流学术前沿,研究人员之间也经常相互流动。紧接着访学人数较多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不过访学的国家(地区)却没有厦门大学多,但与北京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相比还是比较广泛,涉及到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以及中国的香港和澳门。北京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访学的国家相对比较集中,主要为美国。

对访学经历进行分析,有以下四个发现:第一,美国是所有学校中访学次数最多的国家,这与上面留学经历的原因基本相符,缘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达,具有较多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方面。第二,各个院校研究人员的访学对象较一致,也就是说这个学校会有很多研究人员去同一个地方进行访学,这可能由于学校本身和国外的某所高校建立了较好的关系,来往相对比较容易。第三,在访学经历调查中,发现一些研究人员外出访学的目的仅是进修英语,笔者认为短期的访学并不能使英语有很大的提高,无法达到预期目的,这种访学的价值不大。第四,能够到国外访学的人员多为副教授职称以上的研究人员,而年轻的研究者外出访学的人数较少。

4. 学术谱系

在表4中,“本校毕业的人员”是指研究人员在本科、硕士和博士的某个阶段曾在目前工作的院校就读过。在统计分析中,13所高校的研究人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员都曾是本院校的学生,也就是说绝大部分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都是“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即从哪所学校毕业就留在哪个研究机构任职。按照调查的实际情况,有6所高校的本校毕业人员所占的比例都超过70%。这也就意味着目前很多学院并没有打开大门,面向所有院校的毕业生进行择优录取,而主要是对自己学院的学生进行自我吸收。

表4 21所高校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本校毕业情况统计

学校名称	统计到的人数(人)	本校毕业人数	所占比例(%)	学校名称	统计到的人数(人)	本校毕业人数	所占比例(%)
东北师范大学	4	4	100.0	北京师范大学	11	6	54.6
西南大学	4	4	100.0	华中师范大学	4	2	50.0
西北师范大学	1	1	100.0	上海交通大学	11	4	36.4
华东师范大学	10	8	80.0	浙江大学	11	4	36.4
厦门大学	26	20	76.9	苏州大学	3	1	33.3
北京大学	20	12	60.0	湖南师范大学	4	1	25.0
南京大学	9	6	66.7	清华大学	9	2	22.2
华中科技大学	17	11	64.7	北京理工大学	4	0	0.0
陕西师范大学	8	5	62.5	武汉大学	2	0	0.0
南京师范大学	5	3	60.0	华南师范大学	2	0	0.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4	57.1				

数据来源:根据21所高校院校网页中的师资简介统计整理而得。

四、研究结论

通过对这21所高校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的基本情况、教育背景和研究方向的调查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队伍发展的总体情况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研究人员数量分布严重不均。246位高等教育学专职研究人员在21所高校中的分布非常不均衡,最多的达到26位,最少的只有2位。各个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数量上的差距间接地反映出其研究实力的差距。那些在高等教育研究事业中一直保持较强研究实力的院校,通常都拥有一支发展良好的研究队伍,例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因此一个研究机构若想增强研究实力,必须注重对研究人员的引进及其研究能力的培养。例如,南京师范大学作为较早获得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

为了提高研究实力,应该积极地扩大和发展研究队伍。而西北师范大学则更需要做好研究人员的引进工作。各个机构应该有针对性地做好研究人员的引进、培养以及发展工作,才能够保证我国高等教育学整个研究队伍的良好发展趋势。

第二,研究方向的宏观化。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够发达以及我国传统的整体式思维模式有较大关系。过去的几十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几经波折,每一次的变动都与国家政策的修订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当前的发展状态并不是完全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外在和内在力量共同促使的。正是这样的发展背景,让学者们更注重对教育发展方向的研究,也就是宏观政策方面的研究,到底我国的高等教育究竟该走哪条路,怎么走才最适合我国高教的未来发展。研究方向的宏观化是当前高教研究的一个特征,但也只是高教研究发展的一个阶段特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程度越来越发达,体系越来越完善,必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转向微观的研究。

第三,教育背景的多元化。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教育学科出身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即便到博士阶段这个比例也才近七成,而在学士阶段所占比例仅为36.63%。这个现象的形成与我国大学本科阶段不易更改专业有关,同时大多数人到硕士阶段才相对明确自己想要从事的研究领域,从而跨考教育

学研究生。另外,由于教育学是全国统考学科,也成为促使一部分学生选择考教育学研究生的原因。总之,各种原因促成了高教研究人员的多学科背景,但这种多元的学科背景对于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发展并不是坏现象,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它涉及多个领域的知识和内容,因此具有多学科背景的人员对其进行研究应该说是一种好现象,因此应该保持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学科背景的多元化。

第四,国际化程度较低。无论从研究人员的留学情况还是访学经历,都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的国际化程度较低,这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是,当前这一情况也在逐渐改善,需要大幅度增加研究人员外出学习深造的机会。尤其适当照顾年轻的研究者,他们作为研究队伍的“新生力量”,虽然没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却充满了做学术的热情和新颖的想法,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除了让更多的研究人员有机会“走出去”,也应该尽可能地引进一些知名的外来研究者。在246个研究人员中,只有两位是外来的研究者。为了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来到我国各个高校的研究所,不仅需要我国高校本身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需要制订相关的优惠政策吸引外来研究者。

(责任编辑:王伟宜)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ll-tim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 in China

Wang Ying Hu Ying

Abstract: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246 full-tim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 of 21 universities show that the number distribution are seriously uneven, and most of researchers are middle-aged. In addition, their research interests present institu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macro-oriented,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not high.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encourage micro research,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researcher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increase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full-time researchers, characteristics